



王 奇 著

中苏同盟启示录

Итоги и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 奇 著

中苏同盟启示录

Итоги и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同盟问题既是同期国际关系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中苏关系史发展中必须研究的要害问题,因而一直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选择、米高扬秘访西柏坡、刘少奇秘访苏联、毛泽东首次访苏、苏联援建的“156 项工程”等问题,共同构成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同盟的阶段性历史链条,是解读这一时期中苏同盟问题的钥匙。本书借助已解密的原始档案文献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同盟的确立、实施、破裂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希冀为当今和未来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苏同盟启示录/王奇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302-18660-1

I. 中… II. 王… III. 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9755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 总 机:010-62770175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邮 购:010-62786544

印 刷 者: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230 印 张:15.75 插页:2 字 数:239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28.00 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31330-01

前言

1950年代中苏同盟问题既是同期国际关系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中苏关系史发展中必须研究的要害问题,因而一直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选择、米高扬秘访西柏坡、刘少奇秘访苏联、毛泽东首次访苏、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等问题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苏同盟的阶段性历史链条,是解读1950年代中苏同盟问题的钥匙。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即第一章:“一边倒”外交战略——1950年代中苏同盟确立的基础;第二章:米高扬密访西柏坡——1950年代中苏同盟确立的序曲;第三章:刘少奇秘访苏联——1950年代中苏同盟确立的又一序曲;第四章:毛泽东首次访苏——1950年代中苏同盟的确立;第五章:新、旧同盟条约^①比较研究——1950年代中苏同盟来之不易;第六章:“156项工程”——1950年代中苏同盟的实质性体现;结束语——1950年代中苏同盟破裂原因探析,勾画出1950年代中苏同盟从确立到实施再到破裂的历史全过程。

书中的前六个部分分别列举了相关历史事件的大事记、相关问题的学术之争、相关历史事件的重要原始文献,梳理了相关历史事件的基本史实并澄清了一些史实真相,论述了各个子链条在1950年代中苏同盟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特别是借助已解密的原始档案文献对1950年代中苏同盟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系统的比较研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的理念的同时,希冀为当今和未来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结束语部分探讨了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① 新、旧同盟条约分别指1950年2月14日中国共产党新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目 录

1 “一边倒”外交战略——1950年代中苏同盟确立的基础	1
大事记	1
一、中外学术界有关“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研究	2
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来龙去脉	13
三、“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实施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16
附录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8
2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1950年代中苏同盟确立的序曲	29
大事记	29
一、关于米高扬秘访西柏坡的学术之争	31
二、斯大林五次婉拒毛泽东的访苏要求	32
三、“我们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	43
附录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	48
3 刘少奇秘访苏联——1950年代中苏同盟确立的又一序曲	61
大事记	61
一、鲜为人知的刘少奇秘访苏联及其争议问题	62
二、六次“私”邀，不辱使命	64
三、秘访成果及其遗留问题	87

附录 1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1949 年 6 月 27 日)	88
附录 2	毛泽东经由刘少奇转交斯大林的电报 (1949 年 7 月 25 日)	91
附录 3	刘少奇就带专家回国事宜致斯大林的信 (1949 年 8 月 2 日)	94
4	毛泽东首次访苏——1950 年代中苏同盟的确立	96
	大事记	96
	一、关于毛泽东首次访苏的争议问题	98
	二、马拉松式的莫斯科会谈	100
	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双方战略利益的 协调与统一	110
附录 1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 年 12 月 16 日)	115
附录 2	毛泽东与罗申关于访苏安排的会谈纪要 (1950 年 1 月 1 日)	120
附录 3	毛泽东与维辛斯基谈话纪要(1950 年 1 月 6 日)	122
附录 4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 (1950 年 1 月 17 日)	125
附录 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 年 1 月 22 日)	129
5	新、旧同盟条约比较研究——1950 年代中苏同盟来之不易	134
	大事记	134
	一、新、旧同盟条约签约背景之比较	136
	二、新、旧同盟条约谈判历程之比较	138
	三、新、旧同盟条约内容之比较	143
附录 1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 年 8 月 14 日)	147
附录 2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	152
附录 3	《关于大连之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	154
附录 4	《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	156
附录 5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1950 年 2 月 14 日)	158

附录 6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 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1950 年 2 月 14 日)	160
附录 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1950 年 2 月 14 日)	162
6 “156 项工程”——1950 年代中苏同盟的实质性体现	164
大事记	164
一、中国学者有关 1950 年代苏联援华问题研究	165
二、“156 项工程”的确立及其实施	186
三、“156 项工程”对同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192
附录 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第 73 号记录(摘录) (1950 年 3 月 22 日)	198
附录 2 葛罗米柯关于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中国五周年国庆 给苏共中央的请示(1954 年 9 月 15 日)	199
附录 3 苏联外交部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事宜给尤金的信 (1954 年 12 月 27 日)	200
附录 4 贾丕才关于供给中国一系列企业设备问题致尤金的电报 (1956 年 6 月 6 日)	211
附录 5 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 (1959 年 1 月 27 日)	213
附录 6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8 年 7 月 31 日)	218
附录 7 苏斯洛夫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节录) (1959 年 12 月 18 日)	235
结束语 1950 年代中苏同盟破裂原因探析	240
后记	243

“一边倒”外交战略——1950年代 中苏同盟确立的基础

大 事 记

• 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一边倒”。

• 1949年7月4日

刘少奇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交报告，报告中提到，“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 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政策的原则精神被吸收到《共同纲领》中，这就从法律角度进一步确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

• 1950年2月14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中苏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固定下来，“一边倒”方针最终得以实施。

涉及1950年代中苏同盟的确立，首先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要考察同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来龙去脉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本章中将就中外学术界有关“一边倒”外交战

略研究、“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来龙去脉、“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实施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中外学术界有关“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研究

中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成因、“一边倒”外交战略是否是当时唯一的“最现实主义”的选择以及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利弊等问题展开的。

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有关“一边倒”外交战略出台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形势决定论。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是促使时任领导人做出“一边倒”战略选择的根本原因。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美国积极扶蒋反共,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国内形势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定,急需国际上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同时还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因而迫切需要国际援助。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何以为安”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制定内外政策的出发点。究竟如何通过外交途径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呢?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活动应当实现的主要目标,一是保障新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二是应当尽可能地获得外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尽力避免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陷于孤立境地;三是为新中国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四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争取获得必要的、尽可能多的国际援助。同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到,在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成果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方面,新中国不但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只有继续联合苏联,在美、苏对立中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才能维护新中国刚刚获得的独立,有效地抵制和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打破它们对新中国的封锁,才能避免新中国外交上的孤立,争取到一个有利于新中国的和平国际环境及获得新中国进行经济文化

建设所必需的国际援助。相关的学术观点主要包括：陶文钊认为，“‘一边倒’并不是中共的一贯方针”，而是中美关系演变的产物，“一边倒”是“被美国逼出来的”。^① 郑晓国、李万青、蒋建农、杨公素、徐小明、于岩青、贺朝霞等学者都与陶文钊持相近的观点。^② 谢益显认为，中共“虽然具有坚定的反帝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与美英等国家打交道的可能”。他强调，从中美关系演变的进程看，“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与美国发生关系，而是美国一次又一次地以中国共产党为敌，并从而排除了中国共产党在美苏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③ 孙其明认为，“一边倒”的提出固然确实考虑到了美苏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对美苏两国对华政策做出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是中共领导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原则主动做出的抉择”。^④

第二，意识形态决定论。认为这是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决定性因素。首先，中苏两国具有相同的社会主义政治理想：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是人民民主国家，都在为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其次，中苏两国的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斗争营垒上同属于一个体系，“二战”后冷战局面的逐步形成使意识形态得以强化，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的重要促进因素。进言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并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发展中国。因此，新中国即将诞生时，在毛泽东等中共

①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决策》，《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

② 郑晓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49～56页。

李万青：《对建国前后我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历史分析》，《求索》1995年第2期，第121～124页。

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21～28页。

杨公素：《“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19～22页。

徐小明：《我国建国前后的“一边倒”外交策略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浙江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第46～49、54页。

于岩青：《“一边倒”外交思想形成始末》，《历史教学》2003年第6期，第73～76页。

贺朝霞：《“一边倒”不是新中国的一贯外交方针》，《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第80～83页。

③ 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④ 孙其明：《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2期，第7～12页。

领导人的心目中,新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事实上,此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但决心继续坚持其一贯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也是以这种意识形态分析国际形势,对美苏等国做出判断并决定其外交政策的。相关的学术观点主要包括:刘建飞认为,“新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做出‘一边倒’的抉择,是与他们的革命理想和当时的客观环境分不开的”;“一边倒”的理论支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边倒”是由中共所奉行的“反帝民族主义”决定的。^①他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在新中国“一边倒”外交决策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首先是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其次是反帝民族主义。“二战”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形势使这两种意识形态得到强化,构成了“一边倒”的重要促动因素。“二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时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虽然也促使新中国领导人做出“一边倒”的决策,但不是决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亲苏”是新中国领导人的必然选择,而在冷战的大格局下,“亲苏”就不可避免地要“反美”。^②牛军在解释“一边倒”的成因时没有使用“意识形态”的字眼,而是用“革命性”表达了与刘建飞类似的想法。^③张郁慧则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影响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外交决策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内容包括奉行国际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三个方面。此外,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怀疑构成了新中国“一边倒”外交决策的外部意识形态压力。^④

第三,国家利益决定论。认为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原则是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首先是美国的反华政策严重损害了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是与苏联结盟有利于新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任何外交政策的制定都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相关的学术观点主要包括:金春明在评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一边倒”所做的种种解

① 刘建飞:《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② 刘建飞:《意识形态对新中国“一边倒”决策的作用》,《国际论坛》2000年第5期,第43~48页。

③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23~42页。

④ 张郁慧:《向苏联“一边倒”外交决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3期,第79~82页。

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具体而言是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是新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同时还有意识形态的吸引。^① 戴兰华重点考察了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认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所重点考量的因素。^② 时殷弘、张小明、孙其明、李海燕、潘正祥、鲁凤^③等也都有类似的主张。段益、袁天亮则明确提出,战后美国、苏联、国民党、共产党这样一个多链条的“三国四方”关系在各种利益取舍面前逐渐变化,国民党反动本质进一步暴露,最终使美蒋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中共积极主动促成中苏结盟,形成了一种渐进的倾向于苏联的友好关系;“一边倒”政策是从中苏两国的安全力、经济力,阵营利益等综合实力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理性回应,中共实行“一边倒”并不仅仅出于意识形态,更是因为这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国家利益。^④

那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选择“一边倒”在当时是否是“唯一选择”呢?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陆文培认为,当时如果不顾及到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不考虑苏联与中共的多种关系,首鼠两端去搞所谓等距离外交,待“中立”政策受挫之后再“一边倒”,那就势必得到最坏的结果。“一边倒”政策,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站在苏联一边,这是巩固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⑤ 张小明认为,在理论层面,“一边倒”似乎并不

① 金春明:《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② 戴兰华:《略论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95~99页。

③ 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41~51页。

孙其明:《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2期,第7~12页。

李海燕、潘正祥:《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点》,《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第88~93页。

鲁凤:《从国家利益视角看“一边倒”外交政策成因》,《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67~69页。

④ 段益、袁天亮:《从旧同盟到新同盟——对建国初期“一边倒”政策的再思考》,《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第106~107、124页。

⑤ 陆文培:《外交“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分析》,《理论建设》1994年第4期,第73~76页。

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在处理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时,新中国至少可以有以下三种不同选择,即: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但在实际上,新中国难以做出前两种选择。^① 杨公素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当时不宣布‘一边倒’政策,采取一方面与苏联加深联系,一方面又与美国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那将在外交上是中立政策,但实际上是孤立政策”,因为除非中共接受美国条件,否则与美国就不可能若即若离;如果与美国若即若离,则很难与苏联加深关系。^② 王志民则强调,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苏联,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从中国方面看,中共始终认定帝国主义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中共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首要目标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独立,中国对美国在这方面没有调和的余地。至于美国,虽然内部对华政策有过不同声音,决策层也有过不同的政策考虑,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始终是政治上孤立、军事上遏制、经济上封锁,“中国政府应该面对的是现实,而不是把极小的可能性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③ 郭琼、李妍、丁明^④等学者都持类似的观点。

孙其明则认为,从理论上讲,美苏冷战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只能在美苏之间“一边倒”,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从实践上看,“二战”以后确实有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在美苏之间采取了“中立”政策或基本上处于“中立”状态。从历史演变的进程看,战后美苏对立持续了许多年,而新中国的“一边倒”并没有与美苏对立相终始,相反仅到了1950年代后期就逐渐地

① 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41~51页。

② 杨公素:《“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19~22页。

③ 王志民:《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第51~55页。

④ 郭琼:《试析中共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的历史原因》,《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S1期,第42~43、39页。

李妍:《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95~98页。

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92~99、126~127页。

被抛弃了。基于以上理由,他认为“一边倒”是当时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选择”。而中共之所以在美苏之间没有选择“中立”而是选择了“一边倒”,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中立”不但不能改变西方阵营敌视中国的政策,反而可能使新中国陷入外交上的孤立;意识形态取向也使得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在美苏之间走中间道路。^①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一边倒’未必是对中国最有利的政策”,“新中国当时完全可以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这样就可以在外交上争得主动而游刃有余”。^② 有学者则明确提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只有对苏“一边倒”的唯一选择。隋淑英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是美苏的冷战在欧洲的不断加剧,另一方面,美苏的冷战尚未蔓延至亚洲。此时的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正在逐渐拉开与国民党政权的距离,期待以政治、经济的手段分裂中苏、促使亚洲的均势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包含着十分复杂的内容,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的意图,不应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必然走向敌对。因此,新中国的外交决策也并非只有选择对苏“一边倒”,中美尚存在发展正常关系的余地。苏联的对华政策是通过中苏的结盟确保其远东地区的安全,同时以中国作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若非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只有对苏“一边倒”的唯一抉择,而是存在着一定的空间和周旋余地。新中国刚刚成立就以意识形态是否相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是不利于国家的发展的。更何况,从战后的世界格局来看,虽然是形成了美苏两极冷战体制,但在力量对比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以及价值规范和国际规则体系方面都显著地占上风,新中国要摆脱受压迫、受凌辱的境遇,既需要抵抗其中的压力和困难,也需要通过必要的妥协来获取其中蕴涵的种种机遇和动力。即使政权更迭,国家利益也不会改变,因此,外交的基本政策也不应发生重大的变化。而新中国诞生伊始就

① 孙其明:《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2期,第7~12页。

② 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王志民:《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第51~55页。

宣布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并挑战世界秩序,结局可想而知。^①

有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选择“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历史评价,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总体上是给予充分肯定的。认为,“一边倒”是“新中国建立时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是在当时国际环境下的唯一正确的抉择”,“它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容怀疑的”^②;“‘一边倒’对外政策是根据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制定的唯一正确的对外政策”^③;“‘一边倒’方针的贯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证”^④;在建国初期的各项外交政策中,“成效最大的就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⑤。具体言之,政治上,为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发展对外关系,粉碎帝国主义的孤立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为世界和平与民主注入了新鲜血液;经济上,为中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和强有力的支持,并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军事上,为中国挫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包围提供了坚强的后盾,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周惠杰、林乐香、罗瑞芳、王国学、李运平等学者都持类似的观点。

也有一些学者除了对上述正面作用仍给予肯定外,不同程度地阐明“一边倒”的负面作用,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过度纠结于意识形态的一致,忽略了国家实际利益的要求;这种偏向的政策,断绝了我们与美欧等国家正常交往的可能;“一边倒”使我们受制于苏联,有损独立自主方针的实

① 隋淑英:《论“一边倒”政策的历史局限性》,《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第50、51~54页。

② 杨公素:《“一边倒”——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的一项外交战略决策》,《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19~22页。

③ 王志民:《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第51~55页。

④ 鲁振祥:《关于新中国三条外交方针的制定——读〈毛泽东外交文选〉》,《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第49~54页。

⑤ 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21~28页。

⑥ 周惠杰、林乐香:《“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质和成效新论》,《北方论丛》1995年第2期,第74~77页。

罗瑞芳:《解放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中国档案报》2003年7月4日第006版。

王国学:《对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再探讨》,《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4期,第55~58页。

李运平:《毛泽东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第134~136页。

现。陈再生专门撰文谈“一边倒”的利弊得失,认为,中国领导人为维护与苏同盟关系,在国家利益上不得不部分地向苏联做出违心的让步;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流,对中国经济建设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同时,还导致中国在处理国内建设问题和国际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以美划线”的偏差。^①统计数字显示:1950年代,苏联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最大贸易伙伴,1950年,中苏贸易额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0%,1953年上升为56.3%,1955年则达到61.9%,1956年比1950年增长6.5倍^②;而同期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却呈迅速下降之势,1950年,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还占到当年全国贸易总额的67.3%,此后基本呈逐年下降之势,1951年至1956年的六年间分别是49%、28.4%、35.4%、25.8%、25.7%、34.2%。^③张秀华认为,由于“一边倒”首先考虑的是意识形态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在同各国建立正常关系问题上的选择范围;“一边倒”影响了独立自主原则的真正实现。^④孟庆凌提出,“一边倒”的消极影响在于:在这一外交战略的影响下,新中国某些时候未能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与苏结盟,当时即付出了一定代价。在1950年的中苏谈判中,中共不得不认可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本框架,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一边倒”的政策客观上缩小了中国外交的活动空间,并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对立与分裂。^⑤刘贵丰、汤合荣撰文指出,“一边倒”在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的同时,也使中国“付出了一定代价”:在经济上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不但如同毛泽东所言使“自己的创造性比较少”,而且因此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后也严重困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外交上由于“一边倒”向苏联,进而“不能不受苏联的牵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自主地和某些国家(如南斯拉夫)发展关系”。尽管如此,“一边

① 陈再生:《“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得失评析》,《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48~51页。

② 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1976)》(一),第487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③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353~368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

④ 张秀华:《对建国初期“一边倒”战略的新认识》,《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第50页。

⑤ 孟庆凌:《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战略解析》,《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第16页。

倒’方针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因为它基本上达到了上述政治和经济的预期目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一项基本成功的外交指导方针”。^① 郑晓国在肯定“一边倒”使新中国“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同时,也揭示了它所具有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一是冷战中的两大阵营是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基础划分的,这一基础与“一边倒”抉择本身虽然并无直接联系,但宣布“一边倒”,实际上就接受了这一基础,从而使“一边倒”作为一项外交方针“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性”;二是在选择了“一边倒”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不受该阵营或集团的制约和影响,这“对于中国在对美外交和其他相关问题上的自主性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制约”;三是“一边倒”的实施,不但使得中国在外交、军事和争取经济技术援助上倚重苏联,而且还使得中国确立起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型政治和经济体制。^② 刘建飞强调,“一边倒”虽然在短期内使得中国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处于对立局面的同时,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支持,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历史事实证明,尽管“美苏两个相互敌对的大国都曾损害过中国的利益,但是相比之下苏联更为严重”。中共选择了“一边倒”,进而也“使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处于对立、隔离的状态”,西方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主流,与西方对立和隔离,无疑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美国对立也使中国的东部边境时常出现安全危机,正是由于东部缺少安全感,中国后来才在经济建设上采取了重内地轻沿海的方针,即“一、二、三线”布局,这也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美国对立也使台湾问题成了难以解决的悬案。此外,“一边倒”也使得中国与一些亚洲民族主义国家以及某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受到制约。^③

① 刘贵丰、汤合荣:《“一边倒”外交方针历史作用的基本评价》,《党史月刊》1997年第3期。
刘贵丰:《“一边倒”外交方针演变和终结的原因探讨》,《理论学刊》1998年第2期,第82~85页。

② 郑晓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49~56页。

③ 刘建飞:《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